

# 十年计划 一朝回首

王安忆

转眼间，上海写作计划到第十个年头，身在其中不觉得，蓦然间回头，多少情景浮现眼前，仿佛从高速列车窗外飞速掠去。2008年第一届，来了三位女作家，非常感谢她们，能够注意到这个初生的“计划”，连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呢，双方都带着恹恹，还有相濡以沫的心情，在炎热的七月和八月的季节里，拘谨地度过驻市时间。第二届，来了五位作家，时间推迟到九月和十月，天气凉爽，大学也开学，就有了和学生们的见面，给“计划”增添一项节目。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其中一位作家因不可抗力缘故半途离开，人数减一名，只比上一年多一位，作为主办方的我们，未免有受挫之感。就像补偿遗憾，这一届中，我们交到了忠实的朋友，充当起信使、外交、宣传的志愿者，从而建立起两地长久的互往。就像水冲出闸门，事情变得顺利起来，申请者比较踊跃了，这也助长了我们的野心，我们尝试着邀请著名的作家，寄期望提高“计划”的知名度，可是事与愿违，回答我们的或者是礼貌的沉默，或者是委婉的拒绝，抑或也有，提出入住星级酒店——对于这个要求，说实话，我们陷入两难境地。能够有成功的作家加盟，无疑能增添“计划”的光采，可是，却违背我们的初衷，那就是生活在市民中间，认识一个日常的海，而不是旅游地。我们的城市上海，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经被符号化了，月份牌上的美人，留声机里的时代金曲，黑帮的夜店，这是一个旧上海，同时呢，还有一个簇新的。这个新上海，在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登场了。比如《碟中谍3》，比如《HER》，都在上海取景的镜头，而这些电影又是传奇的未来的世界，看起来，上海变成一座想象之城。两个上海是上海，又不是上海，说它是，是因为它确实是上海辐射出去的幻象，说不是，也因为这是幻象，幻象中的核子，那个结实的硬硬的毛毡被遮蔽的存在，里面藏着一颗真心呢！这就是我们要让人们看和了解的。所以，我们为“计划”安排的住处是民居的公寓，从窗口可以听见市声，油锅的热和香飘进来，探出头去，底下是店铺、车站、地铁、资金链断裂后的烂尾楼空地。早上晨练的人群，走着匆匆的上班族；晚上，大妈的广场舞开始了；再晚一些的夜晚，本来是清寂的，清洁工的扫帚划在路面上，落叶也划过路面，骤然间，拆除消音器的跑车呼啸而过，携带着二代的财富和颓废，喧嚣平息，路灯的光晕里，流浪猫出没，还有孤独的夜行人，也许因为失恋而失眠。里面有许多故事呢，在等待着发现，将它们从水泥和钢铁的壳子里释放出来。我们要让“计划”中作家看见的，就是它！而星级酒店，却是同质化的产物，还是商业的产物，走进去，你可以想象在任何的资本所到之处，它和在地生活隔离着，也和在地人隔离着。当然，我们非常理解这位作家的要求，生活在陌生的国度里总是让人不安，尤其是亚洲后发展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疏远，人们不知道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星级酒店是个防火墙，给人安全感，代价是遮蔽真相。为了保持驻市的出发点，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这个可能使“计划”名声大振的良机。

在放弃的同时，我们也经历着被放弃的遭际。不算多但也绝对不少，一些作家在最后的时刻，决定选择去另一个“计划”项目，要知道，全世界的“计划”不计其数，我们大概是最年轻最无名的一个，缺乏竞争力。比如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假定同时有我们和他们两个机会，我相信、实际也是，胜出的总是他们，我们呢，也认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



文汇报笔会多年来一直辟专版刊登“上海写作计划”驻市作家的作品，图为2009年（左）和2016年的作品专版。

会放弃争取。每一年的“计划”刚刚结束，我们就开始下一年的准备，在网上发布信息，征询驻沪领事馆的推荐，与各种文化交流机构联络，审核申请人名单和履历，有可能的话，阅读他们的作品，在亚洲的暑热中等待秋凉，九月来到，一位一位作家从扁平的纸面上走出来，变得活生生的，简直就像小说人物。许多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形态，遥远的想象变成现实，模糊变成清晰，也有的是反过来，固定的成见颠覆了。我曾经和一位印度学者聊天，各自描绘对彼此国家的印象，那位朋友说：你对印度的知识全来自西方人著作的书本！这让人惭愧，现在，印度的作家来了；在美国买瓷器，问到产地在哪里，回答说“Portugal”，一时想不出是哪里，又问是国家还是地区，回答是“一个国家，一个美丽的国家”，现在，美丽的Portugal的作家来了；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扎波里亚尔内市的年轻的诗人来了，从北极光里走出来；身患罕见病的作家来了，说是罕见病，更像是阿尔卑斯山的冰雪塑成的，我们叫做“玻璃娃娃”——接受不接受他的申请，我们也考虑很久，瑞士是个高福利的国家，而处于经济飞跃时期的我们城市，发展是不均衡的，有的地方超前，有的地方还在蛮荒，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经过反复讨论，我们的决定是两个字，“欢迎”！非洲丛林里的作家带着她的鼓来了；保加利亚作家则带着她的歌舞；以色列的作家来了，巴勒斯坦的作家说来还没来，终有一天会来到；说着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诗人来了；说着盖尔语的爱尔兰诗人来了；安徒生的乡人也不来了，带来的是另一种童话传奇……

他们带来他们的乡音，加上我们的乡音，互相讲述故事，故事分两类，一类是他们真实经历的，一类是他们虚构假设的，这两类故事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事情的神秘所在，也是我们所以聚在一起的原因，它将互不相识的我们归为同一族群，名字叫“写作者”。神秘性是如何发生的，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有人说酒，酒有致幻的作用，但此“致幻”不是彼“致幻”，后者是无中生有，前者却是从实有出发，抵达虚有。有人说来自喜悦，有人说来自悲伤，有人说来自自由，有人说来自痛苦。我喜欢其中一位韩国作家的说法，她的名字叫做“兰”，是一种花的名字，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家有阳台一枚，南向，五个多平米，平时除了晾衣服，也是我每天有事没事趴栏杆，“望野眼”的地方。阳台上空气流通，然而常有一种幽幽的味道，如盈袖暗香，弥漫在阳台的角角落落，不肯轻易散去。“暗香”从何而来？源头是几只盖子旋得严严实实的塑料罐，一旦拧松，里面的气体便有些急不可耐，趁隙而出。说时迟那时快，一股恶臭直冲鼻腔，几乎可以把人熏晕。

原来里面沉着腐烂的鱼内脏和猪下水。虽说还没修成“五年陈”或“十年陈”的正果，但至少也都是半年、一年的肥汤老窖。

大家十有八九已经猜到，我在阳台上种着花。那是我挤出地方，搭了个不锈钢花架，分层搁着十来盆花花草草。算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迷你“私家花园”。

月季是我的最爱。色彩娇艳，香味甜美，花形性感。清代孙星衍的“才人相见都相赏，天下风流是此花”，可谓道尽了月季的魅力。

其次是米兰和昙花。米兰低调，往往在不经意间又到花期，似粟如金，清香四溢。昙花的一现，是岁月凝练的冰

里，总是象征美好的事物。她讲了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位强迫症患者，去向精神科医生求助，他顽固地以为他的眼睛是一颗煎鸡蛋，而蛋黄随时就要流淌出来，医生对他说，那么你就想象你是一片烤面包，将鸡蛋包裹起来。兰说，我的写作就是那片面包，将溃散的心托住。这个段子很有趣，深想起来，很有道理，写作其实就是寻求安全感，写作者大多是居安思危的病态人格。我还喜欢另一位印度作家的经验，她住在印度腹地的乡村，开一家诊所，为贫穷的村人治病，她的诊所挤满着病人，她说，这就是她写作的源泉。在这里，写作者又成了医生。事情似乎有些矛盾，写作者既是病人又是医生，但是也对，所以我们会两个故事，从一个故事里分离出另一个故事，再从分离出的故事里回到另一个故事。你们看，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有意思。

更多的是不在一起的时间，你们兀自在这城市的活动，有时候三五结伴，有时候自己单个。这座城市越来越庞大，原来的乡村和农田，如今都纳入市区。发展中的国家就是这样，生产和消费的周期越来越短促，一转眼间，高楼起来，高架起来，铁轨铺设，跑着高速列车。放你们在这坚硬的蛛网里转悠，真叫人担心，生怕你们走失，每天都有本地的大人和孩子走失，何况外国人！谢天谢地，过去的九年里，没有发生一桩走失案件，就看今年，第十个年头了。我想也是，写作者都是一只记忆特佳的动物，走过的路，经过的事，都不会忘记，都等着写成文字，虚构成故事，故事可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危险是难免的，首先是穿越马路，有一位以色列作家站在车流滚滚的街沿，就是走不到对岸去，他困惑极了，不知道看绿灯走



桑内·科米勒基（澳大利亚）

## 阳台上的花肥

千里光

清玉洁，那一刻，惊鸿艳影，平日里所有漫长的等待都值了。喜欢它们，也是因为不太需要过多的溺宠。很多人喜欢用“贱”来形容一些长得顽强的花草，但我只会说它们“省心”。仿佛一切都是约定俗成，按着老天爷定下的规矩，该怎么长就怎么长；不经意间，一株株嫩芽蹿了出来；无意之中，一颗颗蓓蕾脱颖而出，含苞昂首……

然而，省心不等于可以当甩手掌柜。农谚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的这些庄稼，又恰恰都是不怕肥、肥不怕和怕不肥的“吃货”。肥不足，则营养不良，结的铃开的花，又瘦又小，可怜巴巴。花店有化肥，氮、磷、钾出售，不

同的生长期施不同的肥，但我健忘，曾有一次出错，不知是错把氮肥当成钾肥，还是把磷肥当成了氮肥，活活烧死了盆“Blue Moon”。面对那盆往日里娇艳欲滴的香水月季，一下子垂头丧气、无可救药的样子，我爱莫能助，一筹莫展，只有发誓再不用化肥。同楼的一对老夫妻，家里种着一盆昙花，据说一年开两三回，每回欣欣向荣地开二三十朵花。每次见到我都千叮万嘱：肉汤，肉汤！他们让我经常熬些肉汤、骨头汤，先往花盆里戳两个洞，然后一路灌进去，直灌到花的根须都吸足喝饱，说是大补。道理我自然懂得，只是特地买肉买骨头，还煮熟，未免太讲究。那些原本

还是看红灯走，因为他发现，红灯亮起来的时候，路上不定有车，绿灯亮起来，前后左右都来车了；保加利亚的作家的遭遇就更诡异了，她遇到一对男女，诱她到取款机上拉卡，无奈她信用卡的额度已满，只拉出两百美金，她似乎并不感到侥幸，反而有点遗憾，因为，那一对小骗子年轻漂亮时髦热情，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方才说到的韩国“兰”，她也是遇到一对小男女，主动为她照相，就这么一换手的工夫，包里的钱不翼而飞！我们的城市，原来还藏着那么些美丽的机灵的盗贼，简直像飞行员，在林立的高楼上空俯瞰着，哪里有得手的机会。来自各国的作家都是运动健将，喜欢长途跋涉，那一位爱好书法的匈牙利作家，从居住的西头，徒步走到东头福州路，真佩服他怎么找得到，许多年轻人未必知道那里有着许多旧书店，还有文具店，他买了一大抱宣纸，再徒步走回来，汗淋淋的，似乎隐喻着文化的重负；有两个北欧作家，有着古代海盗的体魄，是不是用指南针定了方向，认为朝东走去，一定能走到东海，于是就迈开大步，向前，向前，好像中国神话“夸父追日”，结果走到铜川路水产市场，就当是渔人码头，方才打住，折返回头。就这样走啊走的，有一次走进剧场，台上正演出中国京剧；又有一次，走到一座古典园林，上演的却是西方现代剧。期和不如期的，就在脚底下生出来，然后再带给我们，要知道，人们总是漠视身边的事物，司空见惯的表面底下其实有许多惊奇呢，现在，他们告诉了我们，点燃了我们的求知欲。所以，冒险是值得的，不仅为他们，也为我们。此时，上海，似乎成为我们共同拥有的秘密，然后共同揭开，再共同答案。

时间过得飞快，中国有一句形容，叫做“岁月如梭”。中国的语言真的很有意思，不仅是它的象形，不仅是它清脆的单音节，更是因为它造型的能力，它可将抽象的事物变成具象的，又可将具象的事物变成抽象。这句话就是，岁月本来是虚无的存在，伸手一捞，捞一个空，可是“梭子”却是具体的，在它的来回穿行中，时间就有了经纬，有了幅度，有了占位。我以为，“岁月如梭”这句话，在形容速度的同时，还表达着时间的实体的性质，这个实体就是记忆，假如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记忆，时不时地念叨念叨，这记忆就会变成现实。大概就因为此，人们需要有一些特定的日子命名，新老朋友聚于一堂，好比今天，我们“上海写作计划”的十周年纪念日。

2017年6月27日 上海

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名的短篇小说圣手雷蒙德·卡佛，如今亦已是属于上一辈的一代人，而且他故世得早，让人感觉离现在更远了。我在购买译林出版社的那一册《大教堂》短篇集译本时，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还是新的。后来才知道，由于一位日本的颇有人望的当代作家也喜爱卡佛，并且特别地钟情于卡氏那篇《在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无意中便把卡氏的名字以及那个让人感到新奇的句式传播开来了。所以，当我心里还在问这是谁的时候，周围不少人对于卡佛的名字已经是十分熟悉了。

也许是本人的一个偏见，对于新的作家，无论中外，总提不起很大的兴趣。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这一个卡佛的名字和他的这一册短篇集，却是如何看到了买下来，而且极有兴趣地通读了一遍呢？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由于无意之中拿起随手翻的几页试读，却一下子有点放不下来了。说来也对不住得，那个引起兴趣的兴趣点，也还是在以前的老辈有得手的契诃夫和海明威这两位大师，也是多所致意。他在说到契诃夫时，有这样一段话：“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的。”卡氏自己说，用普通却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椅子、窗帘、叉子甚或一块石头、女人的耳环，赋予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做得到的。一句表面上无伤大雅的寒暄，却传出冷彻骨髓的寒意，这也是做得到的。卡氏说他不可能以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俗事儿”，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到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之类“庸常事物”的人，他会替他们感到羞耻。

而在说到海明威时，卡氏更是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钦服。他曾引用海氏的一句有名的话：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这即是海氏所谓的冰山原则。卡氏不仅同意而且是那么深刻地地对之有理解，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与小说中可见部分一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和被暗示的部分，那些平静表面下的风景。他说他喜欢的是“能见度低”的作品。这个话说得实在很有深意，因为这与读到杰出作品时的感受是一致的，好作品往往是“说不大清楚”的，当你说出一种感觉或者感受时，却总觉得说上便有更多的话已经等待在那里，想要来补充。

卡佛是一个他“过的生活”与他“写的生活”分不大开的作家。他说他当然不会把他邻居直接写到他的小

说里，但是他常常听在耳朵里的“春天到了、要大扫除了”之类邻居的念叨，却无论如何总会钻进他的小说里。卡佛的一生，经历了各种的生活的曲折，他是完全浸在生活的肌理当中的一位作家，所以他的小说里，对于平静之下的忧伤、欢笑后面几乎无泪的愁苦、逝去的生活中的留存或者留存中的已逝、猛烈燃烧中的灰烬以及缓慢腐朽中的“热情”和燃烧，甚至是无悲无喜、无奈却是本然的没有表情的生活，都是特别地有他的体察和体会。

卡氏小说里常常会有“小时候”和“当初”的字眼，比如那篇《羽毛》中同事家里女主人一副不整齐的牙齿的模型和她养在家里的一匹孔雀，在女主人的心中那都是珍贵的留恋和回忆。那副模型里面，有当初丈夫对自己的温情和体贴，让自己花大的代价换来一口漂亮的牙齿。那匹孔雀是小时候翻看图画书的时候，看见孔雀是多么的美丽而且可爱，一心想着将来能够在家里也有这么一个朝夕在一起的伙伴。“小时候”和“当初”，都会留存在后来的实生活当中，温情和孔雀都在，但那心里的实感，却在各人之中都有说不清楚的差别，上门做客的客人，当然也能听懂女主人诉说的这些小时候和当初的来龙去脉，却不大大会多嚼几眼那样难看的牙齿的模型，也不大会喜欢孔雀臭烘烘的味道和盯着人看的眼神。再比如那一篇《保鲜》，女主人在家里冰箱坏了之后，想到了拍卖会，时间就在当天的晚饭之后，她一下子感到了振奋，急切地想赶到那里，因为她“小时候”跟着她父亲去过好多次，这里面有多少当初的回忆。但她的这一份实感，却连她的丈夫也不可能知道和真正懂得，看着丈夫回到沙发旁边的一双慵懒洋着的脚，“小时候”和“当初”又回到了多少有点冷冰冰的实生活当中，那味道已然有点儿不同了。

在卡氏小说里，连那些生活里的大悲伤，也并不如一般想象中的运用浓重的笔墨，来描述那强烈的情感和情绪。他用的笔，还是“能见度”不高的。比如《好事一小件》当中，夫妻俩的小儿子，因为一场并不太严重的车祸而受了一点看上去并不致命的小伤，但是应该苏醒的时间早过了，那儿子却是醒不过来。最后因为一个十分隐蔽的内出血，儿子不治而亡。这在一个家庭，总是一个大悲痛。但在卡佛的笔下，却是插叙进一个面包师的看似旁枝的故事。那个儿子出车祸的当天，正好是他的小小的生日，他妈妈事先到面包师那里预订了生日蛋糕。出了事，谁也想不起那个蛋糕，更不要说去领回家。于是面包师便反复打电话到他们家，却是有点“不怀好意”地不明说，只道“你们是不是把儿子忘了”。最后是妈妈想起了起来，对于那个面包师是那么的愤怒，便半夜赶了过去。当面包师明白了他们的处境，便拉了椅子让他们坐下并吃刚出炉的面包。面包师说孤独已让他不知怎样待人处事了，他每天对着大家预订的蛋糕，其实就是直面着一场场喜庆的结婚、生日及各自的欢宴，反过来更形孤独了。这些话，都说得很淡。天亮了，夫妻俩却还没想到要离开。

卡佛的笔，就是这样的“能见度低”，让你似乎看到很多、想到很多，有不少的话要说，但也有说不清楚到底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他在《大教堂》这一篇里，借着“手把手在纸上描画来告诉盲人大教堂是什么样子的”这一个故事，其实却是有点在“夫子自道”，说的既是生活，也是写作。生活当中真正的悲喜与言行，能见度哪里会很高呢？都只不过是辛稼轩的那一句“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而已。那么，即便这样，还是聊且说说，手把手描画一个“大教堂”，也算得是彼此温暖一下各自的心。

这样的场景是近年常去的“农家乐”也找不到了。因为，已经闻不到以前的那股味道。大田里都只施化肥。难怪，现在的农村，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农村的味道。